



抗战时期

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

张根福 岳钦韬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抗战时期

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

张根福 岳钦韬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张根福,岳钦韬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757-6

I. 抗... II. ①张...②岳... III. 社会变迁—研究—浙江省—1937~1945 IV. 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6815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特约编辑 王卫东 陈敬山

封面设计 傅惟本

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

张根福 岳钦韬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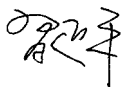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462,000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757-6/K·1584

定价 45.00 元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

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

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and 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 10 余个系列 400 余项研究课题,完成 230 项课题研究,出版 200 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 年 6 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 年 9 月 10 日于杭州

绪 论

一、学术前史

抗日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浙江人民经历了全面抗战的整个过程,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全中国人民、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筑成了反侵略战争的钢铁长城,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彻底破产。”^①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对浙江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早在抗战期间,就有一些描写战争初期的史实类书籍问世,较为典型的有《浙西初期抗战史话》^②、《抗战中之浙西》^③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政协及各市县政协的文史资料相继刊载了一些战时亲闻、亲见、亲历者本人自撰或口述之作,其中不少涉及战时工商、金融、文化、学校等方面的内容。此外,1966年王梓良在台湾编撰出版了《浙西抗战纪略》^④,台湾的《浙江月刊》、《传记文学》等杂志也刊登了不少回忆性文章^⑤。但这些作品大多属于史料或回忆性资料,还谈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对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的研究较为薄弱。

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学术的繁荣及研究禁区的逐渐打破,一批带有通史性质的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如楼子芳主编的《浙江抗日战争史》^⑥、金普森、陈剩勇主编的《浙江通史》(第十二卷)^⑦以及袁成毅的《民国浙江政局研究(1927—1949)》^⑧、王国林的《天目抗日》^⑨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抗战八年浙江的历史进

① 楼子芳主编:《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

② 浙西民族文化馆1944年版。

③ 天目书店1940年版。

④ (台)中国文献出版社,后收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8辑,(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影印版。

⑤ 参见周元正编:《台湾出版抗日战争史著作论文索引(1950—1987)》,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⑥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⑦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⑨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程,从而将浙江抗战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关于战时浙江社会各方面的研究也取得重要的进展,尤其是对日军侵略、战时政治经济、战时文化教育、战时人口迁移以及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等有了很大的突破。

在军事政治方面,1995年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并出版了《铁证——侵华日军在浙江暴行纪实》^①,收集了大量的回忆材料与地方志记载,并对日军在浙江的暴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同年,浙江档案馆和浙江省党史征集委员会联合出版了《日军侵略浙江实录》^②,该书收录了1937—194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浙江期间所形成的大量档案材料,涉及日军对浙江的军事侵略、政治统治、经济统制、文教侵蚀、侵浙暴行及造成的损失等方面,它力图客观地反映日军侵略浙江的原始概貌,具有极高的史料与研究价值。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日军的细菌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张世欣、邱明轩、丁晓强等相继发表了一批相关论著,论述了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及其对当地造成的危害^③;政治方面的论著不多,代表性的有王国林的《天目抗日》^④以浙西行署为中心,详细分析了浙西在浙江抗战中的历史与地位。朱俊瑞、李涛的《民国浙江乡镇组织变迁研究——以新县制为中心的分析》^⑤一书,全面分析了战时新县制在浙江的建设、发展及其对乡镇社会变迁的影响。

战时经济方面则以战争损失的研究最为瞩目,王梓良撰写的《八年抗战中浙江省损失调查》^⑥,简要叙述了战时浙江损失情形及调查概况;袁成毅出版了《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⑦一书,依据大量档案资料、地方志对战时金融、工业、交通、农业、文教、医疗及人口等方面的损失进行了系统考察与量化分析,初步探讨了战争对浙江区域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此外,对日本在浙江的经济掠夺也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如周章森、吕红、包晓峰等相继撰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对浙江的经济掠夺》^⑧、《丝绸之府的浩劫——记抗战期间日本对浙江蚕丝业的

①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张世欣:《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邱明轩:《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丁晓强:《关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与研究》,《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细菌战在浙江(一)——日军细菌战研讨会扫描》,《观察与思考》1996年第6期等。

④ 分为《东南抗战前哨》、《浙西战时施政》两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 (台)《浙江月刊》第5卷第7期。

⑦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⑧ 《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

编制与摧残》^①、《论侵华日军对浙江的经济掠夺与破坏》^②等文。对浙江国统区经济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张根福的《抗战时期浙江各地迁设丽水地区的工厂及其影响》^③、《抗战时期浙江省政府南迁对国统区农业生产的影响》^④、《抗战时期银行界的迁移及其影响——浙江省个案研究》^⑤,分别论述了工厂、省政府、银行迁移对推动浙省国统区工业、农业、金融及其他行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刘志英的《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⑥则探讨了作为省级银行的浙江地方银行在战时艰难环境中,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活动,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为浙南山区的开发和坚持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战时文化、教育方面,学界先后出版了一批文化史料,如《金华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⑦、《宁波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舟山市革命文化史料选编》、《温州国统区革命(进步)文化史料汇编》、《丽水地区革命(进步)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浙西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汇编》^⑧、《绍兴革命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⑨、《嘉兴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⑩、《杭州革命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⑪、《湖州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⑫、《浙江革命(进步)文化历史文献选编》^⑬等,为研究战时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基础。此后金延峰、黄旦的《浙江抗战文化》^⑭,王嘉良、叶子良的《战时东南文艺史稿》^⑮等相继出版,对战时浙江的文艺团体、新闻出版、文艺创作等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论析了爱国文化人在抗日救亡和推动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张彬主编的《浙江教育史》^⑯以专章较大篇幅对抗战时期浙江省国统区、沦陷区及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进行了介绍与阐述。

在战时人口迁移方面,张根福自2000年起,陆续在《历史研究》、《抗日战争

① 《浙江档案》1994年第10期。

② 浙江省委宣传部等编:《浙江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05年印。

③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④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⑤ 《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

⑥ 《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⑦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⑧ 以上各书均为1992年印行。

⑨ 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⑩⑫ 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⑪ 1993年印行。

⑬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⑭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⑮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⑯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了有关战时浙江省人口迁移的系列文章,并于2001年出版了专著《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①,对战时浙江省人口迁移的背景、过程、数量与分布、迁移的特征、迁移人口的各种构成、安置与救济等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初步探讨了战时迁移人口对浙江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些空缺。

在抗日根据地方面,1987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上、下)^②、《浙东抗日根据地》^③、《浙西抗日根据地》^④、《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⑤,这些史料性书籍为研究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党、政、军、群方面的文件档案与研究资料。与此同时,一批研究性论著也开始问世,代表性的有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浙江八年抗战》^⑥、《中共浙江党史》^⑦以及金普森撰写的《新四军与浙江省区抗战》^⑧等,对浙江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发展及其军事、经济斗争进行了初步的论述与分析。

此外如丁贤勇的《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⑨、潘国旗的《民国浙江财政研究》^⑩以及尹红群的《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权与地方财政(1927—1945)——以浙江为例》^⑪、杨焕鹏的《国家视野中的江南基层政治(1927—1949)——以杭、嘉、湖地区为中心》^⑫、王合群《浙江“二五减租”研究(1927—1949)》^⑬等著述也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战时浙江社会的各个方面。

但上述代表性成果更多的是关注战时浙江省社会某一侧面发生的变化,或从史实叙述角度阐述浙江省八年的抗战历程,对战时浙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的变迁尚可作进一步全面系统的把握,在史料的运用以及社会横断面的解剖上也可进一步挖掘。为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不但能够推动浙江抗战史向纵深领域的拓展,而且能促进浙江近现代史、社

①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②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中央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④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

⑥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⑦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⑧ 《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⑨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⑪ 浙江大学历史系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⑫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会史等学科建设的发展,对当前的经济文化建设及社会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学作品、口述史料的价值辨析

拙著在利用档案、报刊、调查统计、方志、文集、日记、回忆录等中外文材料的基础上,还引入了一批颇具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主要用于对第六章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探讨。这是因为在研究基层群众的文化(包括他们的生活与意识)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资料收集的种种困难。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是由少数精英来书写的,其内容往往是站在历史浪尖上那些风云人物的言行,平凡百姓的声音大多被淹没在史家及非史家的宏大叙事抑或宏观记录的汪洋大海中。即便是地方志、调查统计、新闻报道等这些蕴藏着丰富民间信息的载体,也出于启蒙和救亡(抗战时期尤其如此)的需要而重塑“大众创造的文化”,使最终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究竟下层人们是否能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①这一道难题摆在了所有研究基层社会的学者面前。近年来在学界目光下移的过程中,有的学者已经开始从戏剧、小说、民间故事等文本中去寻找大众的声音。王笛认为:“虽然民间故事并非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但它们的确揭示了一种文化观念和现象。”^②M. 舍特(Michel de Certeau)也指出,如果说“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谋略”,那么那些“编造的故事”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③。

但是,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运用仍然面临着如何恰到好处的问題。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描述是基于历史事实,然而都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注入了他们的感情、意识、价值观和想象力。尤其是小说这种体裁,其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想象。虽然作者所处于的时代、地域、社会为他提供了想象的基础——“经验”,但是“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④。以《围城》为例:作者钱锺书于1939年秋从上海到湖南,其路线为上海—鄞县—金华—湖南。途中他和同行者一起游览了奉化溪口的雪窦山,但《围城》小说里却“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影。游山自有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①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②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9页。

^③ 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

^④ 杨绛:《事实—故事—事实》,《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第17页。

所以,杨绛认为:小说中“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①,从整体而言“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②。

显然,如果我们对各种文体不加分析而全盘接收的话,也许就会在书写过程中被“想象”所蒙蔽,以致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我们首先应当考查一下哪些文体的史料性更强,更适合作为“证据”。根据《辞海》文学分册对“文学的种类和体裁”^③的分类,现当代文学作品可大致分为散文、小说、诗歌、戏剧文学等,其中散文又可划分为杂文、报告文学、速写、小品^④等。戏剧、诗歌我们一般不予采用,对小说则持“孤证不信”的态度,必要时作为旁证。我们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东南日报》、《浙江潮》、《战旗》等报章杂志上刊布的以及单独出版、印行的散文作品,尤其是报告文学^⑤。报告文学“不能虚构”,而且要“迅速及时地表现出来,发挥社会作用”;杂文、速写、小品等虽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它们以短小、活泼、犀利的议论及抒情方式,针砭时弊、惩恶扬善,进而“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⑥因此,拙著对社会意识的解读将基于这些史料价值相对较高的散文作品。

中国文化重视传承,历史和文化的许多细节都是从口头上、故事中代代相传,上文关于文学分类中未提及的民间文学也可以归入此类。我们在撰写本书之前已经作了较多民间寻访:张根福在研究抗战时期的浙江省人口迁移问题时曾赴金华、衢州各县进行了抢救性的采访,岳钦韬在苏(州)嘉(兴)铁路沿线的寻访中也留下了不少残存的记忆。在2007—2008年拙著撰写过程中,我们又相继采访了蒋风^⑦、凌以安^⑧、冯熙^⑨、刘先正^⑩、楼绛云^⑪等老先生,他们都是当

① 杨绛:《钱锺书写围城》,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② 杨绛:《钱锺书写围城》,钱锺书:《围城》,第362页。

③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文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9页。

④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文学分册,第13页。

⑤ 报告文学在抗战时期的作用与意义可参见王嘉良、叶志良:《战时东南文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0页。

⑥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文学分册,第18页。

⑦ 1925年生,金华人,英士大学毕业,中国儿童文学泰斗。国际格林奖唯一华人评委、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共同会长、原浙江师范大学校长。

⑧ 1912年生,湖州人,战时浙江省教育厅督学、《湖报》社社长,现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⑨ 1909年生,嘉兴人,战时任昌化县教育科科长、嘉属七县联立中学校长。

⑩ 1915年生,嘉兴人,1944年任嘉兴城西区区长期曾营救8名从上海集中营里逃出的英美人士。

⑪ 1919年生,东阳人,驻丽水第三十二集团军(李默庵任总司令)司令部文员。

年的“精英”；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杭州师范大学的一百多名学生组成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团队赴全省各地进行采访，对各地民间的“活史料”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抢救，并于2007年编撰出版了《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①一书。这两方面的口述史料为拙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

与上述口述史具有类似回忆性质的是各地政协刊行的“文史资料”，我们也将之视作口述史料。史学研究历来对这部分资料的应用较为谨慎，编选文史资料的导向性、回忆人的动机、明显的时间错误等使研究者质疑其史料价值。然而由于拙著涉及的是“小人物”的回忆录，相对于那些“大人物”来说，他们有意歪曲事实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回忆出现错误亦属正常^②。正如罗志田所说：“盖回忆录的价值正在其为当事人之记忆，若事事精准，则‘回忆’时必已参考文献，一定程度上已成‘研究’，至少记忆已被修改，反不能得‘回忆’之真相，因而大大降低其史料价值。”^③

拙著对口述史料也采用类似于处理文学作品的手法，于不疑处有疑，在应用过程中注意鉴别。当然，我们也充分意识到，无论是文学还是口述史，以今天的残留文字来重塑过去的生活与意识无疑带有臆想的成分，即便“想象”的程度比小说轻得多，也很有可能扭曲历史真相。因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抗战老人能看到晚辈们的臆测并现身说法，同时一并求教于学界方家及知情人士，以减少我们因曲解历史而产生的愧疚。

三、研究内容与结构

本课题旨在搜集和占有大量中外档案资料、公私记载、报刊资料等第一手史料基础上，吸收学术界的相关成果，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抗战时期浙江省的社会的变迁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以填补浙江抗战史、社会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空缺。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论述战前的浙江社会及战时浙江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发生的变迁。下编选择四个战时社会的典型侧面，即铁路运输、人口迁移、新闻传播、日汪清乡进行分析，阐述它们对战时浙江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第一章《抗战前的浙江社会》，从自然环境、省政建设、政治斗争、社会经济、文教民风等方面简要介绍了1927年至1937年间浙江省的社会状况。1927年

^①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③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32页。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浙江成为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也是其能够全面控制的省份之一。但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在此期间不曾间断,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同时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党政、派阀纷争也此起彼伏。尽管政治斗争持续不断,但省、县及以下的行政组织均开始按照现代政府的运作模式进行建设。十年间,浙江经济因世界经济危机及日本侵华而深受影响,但浙江省政府非常注重经济建设,建成了一批现代化工程,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完善了国防建设。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许多基层民众开始受到教育,社会风气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发生了转变。总体而言,战前的浙江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近代化进程有所加快,为即将到来的抗战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战时浙江军事》,利用大陆与台湾的各种档案、报刊、著述,辅之以日本方面的原始记载与研究成果,对八年间浙江境内发生的2408次大小战事按照重要战役、游击作战、空中和水上作战进行了分类梳理,同时引入了一些统计数据。重要战役包括1937年杭嘉湖战役、1940年三大战役(钱江、镇海、日军十月攻势)、1941年宁绍战役、1942年浙赣会战、1943—1944年三次战役(广德、龙衢、丽温)以及1945年的反攻作战;游击作战分为以国民政府军队为主力的前期作战和新四军领导的后期根据地游击战;空中和水上作战中所涉及的海军作战情况以及1938年至1945年日军飞机在各区县轰炸的次数等,多为以往著述所忽略。最后简要分析了战争对浙江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指出战争给浙江的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巨大阻碍。

第三章《战时浙江政治》,系统地探讨了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三种不同的政治形态及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抗战初期,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和国民党军队军事上的失利,各级伪政权组织相继建立并将控制区从杭嘉湖、宁绍一带,扩大到金华等地。它们在日军司令部、特务机关和顾问的授意、控制下,对沦陷区民众实行严酷的政治统治,依托警察、保安机构、汉奸外围组织厉行法西斯统治;实行“人口”登记与保甲制度,限制民众人身自由;充实与强化爱路村,维护铁路、警备公路和通信网的“安全”以巩固其统治;沦陷区民众政治上、精神上受到严酷的摧残。在国统区,国共两党由对抗走向合作后,黄绍竑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吸纳各种政治力量投入抗战事业。颁布并实施《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施行《浙江省三年施政计划》,调整行政机构、革新县政、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建立浙西行署,组建战时政治工作队,使国统区政治出现新的气象。在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中共始终把民权主义作为政权建设的重点,为人民当家做主创造种种条件,保障根据地民众广泛的民主权利;实施“三三制”原则,保证根据地政权基础的加强;通过重大问题协商及设立“参

议会”的方式,扩大参政议政范围。从而使抗日根据地在革命中不断壮大,民主政权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

第四章《战时浙江经济》,论述了抗战八年浙江经济发生的沧桑巨变。战争期间,一些工商人士为生存被迫迁移他乡,他们或迁向省内前后方国统区,或由原来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县城迁到以广大乡村为背景的市镇,或迁向上海租界、西南各省及皖南、闽北等地,其迁移对浙江省的经济变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政界、工商界、金融界的迁入,推动了后方国统区尤其是浙南地区工、农、金融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一些原先十分落后的区域得到初步的开发。在抗日根据地,为克服日伪顽封锁造成的严重的困难,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如实施减租减息、发展工农业生产、实行战时税收制度、设立银行、发行抗币等,取得明显的成效,巩固与壮大了抗日的经济基础。在沦陷区,日军为加强对重庆政权的经济封锁和推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对农产品及其他物资实行严格的管制,对一些重要物资进行赤裸裸的掠夺与搜刮;通过对原有金融企业的抢劫、发行军票、打击法币、建立沦陷区金融体系等手段实现对沦陷区金融业的统制;并通过军管理、委托经营等方式及利用“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加强对工矿等行业的掠夺。经历了八年烽火之后,战前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的浙江,在农业、工业、商业、林业、矿业、电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城镇房屋等方面均遭受了巨大损失,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窒碍。

第五章《战时浙江教育文化》,主要从多个角度考察战时浙江各类教育的变化及文化事业的兴革。抗战时期,浙江的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的威胁,一些学校被迫停办,高等学校与大部分中等学校则为避免日军战火的毁灭性打击或奴化教育,不得不以避难的方式进行迁移。为使浙省教育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战时相继设立了各类流动学校、临时中学、战时补习学校,新办了许多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1939年实行“新县制”后,教育制度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开始由义务教育制度向国民教育制度转轨,战时教育在困境中前行。在沦陷区,各级日伪组织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引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抗。教育界的迁移、各类学校的组建、国民教育的实施、反奴化教育的推行,使浙江省的教育元气得以恢复与发展,也使一些经济贫困、文教落后的边远地区,开始踏上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初步台阶。在文化方面,众多的文化人相继迁至金华(金华)、处属(丽水)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金华、丽水成为战时东南的文化中心,其他区域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抗日救亡和文化宣传活动,浙江抗战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中兴局面,各类报刊纷纷兴办、进步书业蓬勃发展、多向度新闻传播方式逐渐形成,文学创作如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散文等丰富多彩,戏剧也以其独特的形式唤起